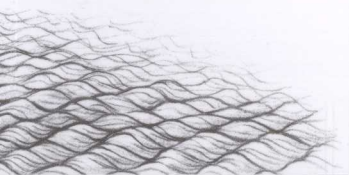


观澜文丛

燕北书城

困学集

◎ 姚伯岳 著



影抄、影刻、影印

风靡近代的照相石印术

扑朔迷离的覆刻本

新奇炫目的书口彩绘

别具一格的清代彩绘地图

流入图书馆的私人藏书

中国古代的图书流通



岳麓书社

-20

观澜文丛

燕北书城困学集

◎ 姚伯岳 著

岳麓书社

G256
Y3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北书城困学集/姚伯岳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335 - 0

I. 燕... II. 姚... III. 古籍—中国—文集 IV. G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673 号

· 观澜文丛 ·

燕北书城困学集

作 者: 姚伯岳

责任编辑: 杨云辉 鄢 蕾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978 - 7 - 80761 - 335 - 0/I · 886

定价: 25.00 元

承印: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目 录

博学笃志 书通二酉（王余光序） / 001

自序 / 005

卷一 书林辨惑 ————— 013

影抄、影刻、影印 / 014

风靡近代的照相石印术 / 018

扑朔迷离的覆刻本 / 024

新奇炫目的书口彩绘 / 041

别具一格的清代彩绘地图 / 047

流入图书馆的私人藏书 / 060

中国古代的图书流通 / 064

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 / 068

中国古籍分类的历史走向 / 071

出版者的版式、装帧设计权 / 079

书刊封皮上的条形码 / 085

卷二 书香传家 ————— 089

明代吴兴闵凌二氏的套版印刷 / 090

闵齐伋与其套版印刷 / 099

黄丕烈的藏书印 / 127

话说“书丛老蠹鱼” / 130

丹青凝风骨，绝学傲书林——序《书林掇英》 / 144

掘越喜博和他的金石拓片收藏 / 153

卷三 书苑说书 ————— 169

弥足珍贵的《麟台故事》 / 170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 181

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 194

《中国藏书通史》评介 / 212

走出象牙之塔的《中国版本文化丛书》 / 217

风味浓郁的《北京古籍丛书》 / 221

卷四 书府撷珍 ————— 227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偶录 / 228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关台湾史料珍籍撮要 / 235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人自著丛书掇拾 / 239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 / 284

卷五 书韵谱新 ————— 291

图书馆藏古籍的计算机回溯编目 / 292

古籍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其系统实现 / 305

舆图描述元数据规范的研制 / 317

“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检索功能综述 / 331

素禀执著意，常怀感恩心——回顾我的事业人生 / 345

博学笃志 书通二酉



我写下“博学笃志、书通二酉”八字，并非是对伯岳的虚夸，而是出自内心的真切感受。我与伯岳相识与交往近三十年，对他的治学与为人有相当的了解。1980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完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并留系执教，钻研版本之学。执教期间，先后出版《版本学》、《黄丕烈评传》等著作，在版本学界颇负盛名。十年前，他转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整日浸润于芸香之中。就我所知，从事版本学者，或长于实践，或长于理论，二者兼长者少。伯岳先钻研于理论，后运用于实践，以理论拓展实践，以实践丰润理论，取精用弘，卓然一家。

近日，伯岳将历年所写的古文献及古籍整理方面的论文汇集成《燕北书城困学集》出版。这些论文大多是他在教学或工作实践中所撰，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实际意义。如北大图书馆收藏清代地图1000余种，伯岳选择其中精美及有代表性的彩绘地图，主持编成《皇輿遐览——北京

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出版。在编撰过程中，撰《别具一格的清代彩绘地图》，讨论清代彩绘地图的特点及所受西学的影响与价值评判标准。正如他文中所说：从这些古代地图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对世界的认知模式、独特的表现手法，等等，从而逐渐意识到其中的文化蕴涵和审美功能”。本集中类似此文者还有《中国古籍分类的历史走向》、《拂去历史的尘埃——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堀越喜博和他的金石拓片收藏》等。这些论文不能仅仅视为实践工作的总结，其亦关涉学术理论的推进。且举二例。

一是中国古籍分类法的问题。此问题已存在近百年了，一直未得到完善解决。伯岳从事古籍编目工作多年，对古籍分类



有切身的体验。现行《中图法》之荒谬，《四库法》之陈旧，同人皆有感受，新编古籍分类法应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惜迟疑至今未见成效。伯岳所作《中国古籍分类的历史走向》一文，并不仅仅是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理论的论证，其意义是对古籍分类法编制的指引。我读此文，不仅深赞作者之观点，亦叹图书馆界深受意识形态之影响与对科学精神的漠视。

另一是私人藏书流入公藏的问题。此问题或许不如上一问题受图书馆界关注，但我认为，对研究中国20世纪之藏书家、藏书之传承，此问题极为重要。伯岳撰《流入图书馆的私人藏书》一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私藏的最终出路，就是化为公藏。这个理念无疑是正确的，是值得大力弘扬的。”遗憾的是我不能苟同他的观点。灭私为公的理念在文明制度下如何能是“无疑是正确的”呢？但在20世纪，中国私家藏书流入公立图书馆，如何流入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的衰落等问题，确实值得学界深究。一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或许比文章中的观点更重要。

关于古籍、古籍收藏与保护，作为一位图书馆的工作者，伯岳在本书后记《素稟执著意，常怀感恩心——回顾我的事业人生》中，写下了一段质朴但却十分感人的话：

我们中华文化就好像一颗大树，重印的、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就好像这棵树地面上的茎干枝叶，古籍的原本、善本就好像这棵树的深根，一般人看不到它们，不知道它们的作用和价值。我们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职

责，就是保护好这棵树的深根，不让它受损，让它正常发挥根的作用，也就是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留住。

此乃智者之识、仁者之心，所谓文如其人是也。伯岳为人随和谦逊，待人以诚，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虽比他虚长几岁，但他一直是我为人学习的榜样。今读《燕北书城困学集》，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他对中国古籍研究的深厚情感与执著追求。是为序。

王余光



2009年3月15日于北大畅春园

自序

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确实有聪明和愚钝之分。但我发现，一个人的天赋对于他的人生事业成功与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成年以后，勤奋和执著与否，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就大小的主要因素。

我一向自认是比较愚钝的一类，而且勤奋程度也远不及我的一些大学同窗如徐雁等，但时至今日，事业上也还能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功，我想可能是由于自己身上一直保留着的那么一点儿执著和韧性了。

孔夫子曾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我是一个典型的“困而学之”者。从我为本书所选的30余篇自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中基本没有什么“随笔”性的文章，都是碰到问题后不得不面对、思考和解决的内容。读者看这些文章不会很轻松，但应该会有一些收获。

我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当时图书馆学系79级和80级本科生实行分组的实验，文科分为中文、历史、经济三个组，头两年分别被分到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学习，后两年才回到本系学习本专业的课程。我由于语文成绩好，于是被分入中文组。在中文系两年的学习，让我受到了系统的文学

史的训练。《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了两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了一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欧美文学史》、《俄苏文学史》、《台湾文学史》统统都学了半年，确实是受益匪浅。但我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一种空幻的感觉，仿佛人被吊在半空中，无所凭依。后两年回到本系，学习了《中文工具书》、《中国文学书籍目录学》、《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书史》、《图书馆古籍编目》等课程，忽然觉得落到了实地上，对以前学过的知识似乎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也恰在此时，和我同班同组的徐雁，拉我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办了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海社，竟然很快就将学海社办成了北大最大的学生社团，我也担任了第一任的古代典籍组组长，并兼任《学海》社刊编辑。就这样，我开始对古典文献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古典文献学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我感觉，首先，文献学把我过去心目中的文学家、诗人，还原成了他们本来的模样，知道了他们原来是官僚、士绅，或者是藏书家、学者；其次，文献学让我知道了那些诗文、小说、故事的文献出处和版本变化，使我明白原来不同的版本，可能会有不同的文本，会有不同的意思和理解。我开始领悟到，对古代典籍的文本关注贯穿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个历史。甚至自汉代以来持续了两千多年、影响中国社会甚巨的经今文学派和经古文学派之争，就是起因于先秦经籍的不同文本。对古代典籍的文本关注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如宋儒是在对先秦儒家经典文本

内容重新阐释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清代的学术研究将心思用在了恢复古籍原本面貌上，所以讲版本，重校勘；建国后的古籍整理则将重点放在了古籍的普及和大众化上面，所以讲的是古籍的标点、注释、甚至白话翻译。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的他们，对于从小爱提问题的我，总是引导我自己去找答案。由于对古典文献学的爱好，当我回到本系学习后，对于一些有关文献学的问题就特别喜欢刨根问底。比如在上郑如斯老师（后来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的《图书馆古籍编目》课程时，一时不很明白版本类型中的影抄、影刻、影印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于是不厌其烦地又查又问，竟然写成一篇《影抄、影刻、影印》的小论文，先是刊登在北大学生社团学海社的社刊《学海》上，后来又被中华书局的编辑看中，发表在《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上，成为本人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大概也正是由于撰写这篇文章的缘故，促使我于1984年考上了本系郑如斯老师的“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努力方向。

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择了对清代大藏书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黄丕烈的研究，题目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贡献》。这篇不到3万字的学位论文，当时竟然受到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10年后匡亚明先生主持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对我的注意，邀请我主笔《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黄丕烈评传》一书。《黄丕烈

评传》已于199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先后获得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二等奖、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提名奖。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系任教，先是和郑老师一起讲授《图书馆古籍编目》，因为意识到版本学知识在古籍编目工作中的重要性，又于1989年秋独立开设了《版本学》课程。几经努力，我撰写的《版本学》一书，也于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书后来经过大的增补和修改，又以《中国图书版本学》的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再版。

1995年，我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初，我的教师生涯结束。应该说，这是我的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

在此之前，由于本系1992年由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以及教学方向的大幅度调整，我已于1993年开设了《著作权法》新课程，并很快被列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到1998年我已写出30多万字比较整齐的讲稿，马上就可以正式出版了。我的《图书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出版者的版式、装帧设计权》两篇文章也是这段时间发表的，反映了我对于这两个与出版关系比较密切的著作权法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但是到1998年，由于系里课程改革的需要，我主讲的《图书馆古籍编目》、《版本学》都被安排到研究生层次讲授，而本科生课程除《著作权法》要继续讲授之外，系里还要求我开出《新闻出版法规》等新课。于是我不得不面对以今还是以古

为主要研究方向的重大选择。经过慎重的思考，最终，我选择了调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以保持自己在图书馆古籍整理方向的继续努力。

从1999年初调到北大图书馆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来，在与古文献的亲密接触中，我收获颇丰。

从1999年秋到2000年秋，我带领古籍部同仁完成了150多万册古籍的从全校各收藏处所搬入新馆地下书库的大工程，并同时完善了古籍书库和古籍阅览室的建设。

从2000年秋到2004年底，我带领古籍部古籍编目组同仁完成了馆藏古籍的计算机回溯编目工作。与此同时，我还主持制订了科技部重大项目的子项目《古籍元数据规范》及《古籍著录规则》、《舆图元数据规范》及《舆图著录规则》。在此基础上设计完成了北京大学古文献资源库的著录系统和发布系统“秘籍琳琅”，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著录系统和发布系统“学苑汲古”。

2004年，我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该馆所藏全部1066种、2465件（册）金石拓片的编目工作。

2008年，我在作为主持人完成了国家《清史》纂修项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历史图像》的基础上，主编出版了《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一书，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对清代地图的研究经验，写出了《论清代彩绘地图的特点和价值》一文。

北大图书馆一向号称收藏有150万册古籍，但直到2005年，其中还有40万册左右未经编目，也就是说，几乎馆藏古籍的四分之一读者尚无法利用。从2006年开始，我和古籍部同仁正式开始对这40万册未编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编目。我担任总校的工作，对所有古籍编目员的编目记录进行审校，每天都要经手二三十部古籍，积累了丰富大量的古籍版本鉴定经验。

二十多年来，繁重的工作压力使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写随笔类的文章，但当我这次比较系统地翻检整理我写过的文章时，我发现我基本上能够将自己做过的比较重要的工作或研究用文章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且这些文章基本都还围绕着古文献和古文献整理这个主题，反映了我这些年来走过的人生轨迹。

例如我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籍分类法》的研制”任务，就写下了《中国古籍分类的历史走向》一文；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归来，就写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掘越喜博和他的金石拓片收藏》。设计完成了古籍和舆图的元数据规范，就分别写下了《古籍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其系统实现》、《舆图描述元数据规范设计与案例分析》等文章。设计了北大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和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也写了《“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的建设》和《“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构建》等几篇文章。

自己性格中执著的一面也使我往往能对一件事保持长久的热情和关注。例如自从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影抄、影刻、

影印》，就一直对这几种版本类型非常注意，并随时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又在最近写成了《扑朔迷离的覆刻本》一文，用上万字的篇幅比较详细地介绍分析了覆刻本这种过去一向认为是影刻本的版本类型。又如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明代吴兴闵凌二氏的套版印刷》，虽然较之以往对闵凌套版印刷的研究已经更为深入，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在这篇文章发表22年后的2007年，我又撰写了长达1.7万字的《闵齐伋与其套版印刷》，对闵齐伋本人和他的套版印刷事业予以全面深入的考察，弄清了许多以往含混不清的问题。由于收在这部集子中的文章跨越了25年的时间，所以一些看似内容相似的文章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以上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图书馆古籍整理是一项实际工作，当然也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项事业。图书馆古籍整理的工作对象是馆藏的古籍实物，所以讲版本的鉴定，以求认识的准确；讲编目分类，以求典藏的整齐有序和检索利用的方便快捷。有人曾问我，古籍到底有什么价值？善本为什么要特别珍惜？我回答，我们的中华文化就好像一颗大树，重印的、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就好像这棵树地面上的枝叶，古籍的原本、善本就好像这棵树的深根，一般人看不到它们，不知道它们的作用和价值。我们图书馆员古籍工作者的职责，就是保护好这棵树的深根，不让它受损，让它正常发挥根的作用，也就是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留住。

我们整天与中国古籍打交道，学科性质与古代的版本目录之学可以说是一回事，把我们的工作归入国学的范畴，似乎也

是理所当然的。但国学是什么，我好像越来越说不清楚了。还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似乎弄明白了这个问题，还曾写过一篇《漫话国学》的小文章，后来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上。现在看来，真是幼稚。版本目录学在清代一度成为“显学”，很是繁荣热闹了一阵。但现在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又加进了许多现代技术的成份，什么“元数据”、“数据库”、“数字化”、“全文检索”等等，这样一来，图书馆的古籍整理还算是“国学”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我更说不清楚了。

姚伯岳



2009年2月12日于燕园